

# 我眼中的阿拉法特(下)

时延春

1991年初,海湾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尽早开始中东和谈,公正解决阿以和巴以问题,以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与稳定。美国为巩固其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和维护其在中东的主导权和战略利益,积极扮演阿以冲突调解者的角色,中东和谈再次趋向活跃。经中东地区有关方面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东和会第一阶段会议于1991年10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相关方面出席了这次会议。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和欧共体的代表先后发了言。因阿以冲突有关方面在诸如土地换和平等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对立,会议未能取得明显成果。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阿以冲突各方终于第一次坐到一起,这意味着中东和谈出现了新转机。

1991年12月10日,第二阶段中东和谈首轮谈判在华盛顿举行,到1993年7月1日,共进行10轮,谈判虽取得某些成果,但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1993年8月13日,第11轮中东和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前,新闻媒体突然报道了一则令世界震惊的消息:在挪威的斡旋下,巴以已连续数月在奥斯陆进行了14次秘密谈判,双方已就实现初步和平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并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实现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

1993年9月9日,阿拉法特总统和拉宾总理互相致函,宣布相互承认。巴解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以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美国的安排下,阿拉法特总统与拉宾总理于是年9月13日在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巴以协议——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这份巴以协议还包括四个附件,即关于选举方式、条件的议定书,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的议定书,巴以经济合作发展计划议定书和巴以关于地区发展合作议定书,以及一份关于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的谅解备忘录。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巴以协议的签署是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步骤,标志着中东和

平进程有了历史性突破。为贯彻这一协议,阿拉法特总统和拉宾总理在开罗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决定成立4个巴以委员会,具体实施该协议的各项条款。针对实施协议遇到的困难,阿拉法特与拉宾于1993年12月12日再次在开罗举行峰会,但未能就自治区范围、撤军具体安排、边界安全保障、释放被关押的巴人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原定于12月13日开始实施该协议的方案搁浅,实施日期只好推迟。

1994年1月10日,负责以撤军安排的巴以安全委员会恢复会谈,但未能达成协议。同年1月底,阿拉法特总统与以外长佩雷斯举行了多轮会谈,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2月9日,阿拉法特与佩雷斯在开罗草签了关于巴以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协议,亦称巴以开罗协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外长穆萨和挪威政府两名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对这项协议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称这项协议是和平道路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994年5月4日,阿拉法特总统与拉宾总理在开罗正式签署了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这是一项实质性协议,是中东和谈和巴以关系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性文件。

随着这项协议的实施,巴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返回加沙的工作。1994年5月12日,阿拉法特组成巴自治领导机构。5月中旬,第一批巴警察经埃及进入加沙,同年7月12日,阿拉法特也经埃及到达加沙。对阿拉法特和巴人来说,这是庄严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时刻。此时的阿拉法特情绪异常激动,思绪万千,热泪盈眶,亲吻着巴勒斯坦的大地,拥抱着巴勒斯坦的亲人。这是生他养他的祖国,是他日夜思念的故乡,是他为之奋斗的家园,是他为之献身的热土。在他离别27年之后,终于又回到自己的国土。他感到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尊严,也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接着,阿拉法特主持了巴自治政府成员的就职仪式,开始了新的征

途。

2000年5月底,我走访加沙写下了《访加沙有感》:

烟波浩淼罩海滩,  
造访加沙忆迦南;  
满目凄凉难民营,  
绿树丛掩定居点。  
自古兵家必争地,  
民无宁日多事端;  
我劝天公扫阴霾,  
普降和平众欢颜。

1994年7月,阿拉法特总统与以总理拉宾及外长佩雷斯前往法国巴黎,共同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博瓦尼和平奖”,这是国际社会表彰他们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所做贡献而给予他们的荣誉。他们在巴黎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巴以定于7月11日开始就实施华盛顿原则声明中规定的和平进程第二阶段撤军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进程中,双方于8月29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协议。9月13日,阿拉法特与佩雷斯应挪威政府邀请前往奥斯陆参加庆祝巴以和平协议签署一周年活动,并签署了奥斯陆宣言。尽管巴以双方在会谈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第二阶段谈判在实质性问题上困难重重。从1994年中至年底,巴以共进行了9轮谈判,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巴以谈判虽一波三折、道路曲折,但双方领导人已有了沿着和谈道路走下去的决心。1995年9月28日,阿拉法特与拉宾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将巴勒斯坦自治范围扩大到约旦河西岸的巴以第二阶段自治协议。该协议规定,以军撤出占约旦河西岸面积1/3的巴城市和村镇,将西岸6座城市的教育、社会福利、旅游、卫生和税收等20余项民事管理权移交巴方;巴应删除其宪章中关于消灭以色列的条款。1996年1月20日,巴自治区举行首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并选出了由88人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

正当阿拉法特与拉宾继续推动中东和谈深入发展时,拉宾于1995年11月遇刺身亡,以于1996年5月29日提前大选,利库德集团右翼人士内塔尼亚胡当选为总理。以新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持强硬态度,强行关闭巴在耶路撒冷的办事处,开通耶

路撒冷附近的阿克萨清真寺地下通道,加紧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导致巴以间不断发生流血冲突。内塔尼亚胡政府将拉宾政府奉行的“土地换和平”原则改为“安全换和平”,提出不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不谈判耶路撒冷地位、不归还戈兰高地“三不”政策,致使巴以和谈长期陷入僵局。

以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的强硬立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导致巴以间暴力事件连续不断。美出于其内政外交的需要,为维护其在中东和谈中的主导权,加大了介入巴以和谈的力度。在克林顿总统的斡旋下,阿拉法特与内塔尼亚胡于1998年10月同赴美国,在马里兰州怀伊种植园就第二阶段撤军问题进行会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讨价还价激烈,整个谈判险象环生,几乎陷入破裂边缘。克林顿最大限度地加大干预谈判的力度,他本人前后6次乘直升机前往谈判现场,对巴以双方施展诱、压并举手段,在9天中花了多达85小时,亲自坐镇掌握,直接介入谈判。10月23日,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代表巴以签署了第二阶段撤军协议,即“怀伊协议”。当阿拉法特回到加沙时,迎接他的既有欢呼,也有诅咒,即鲜花和毒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项协议得以实施,巴在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区可扩大到40%,这将为下一步建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成果得来确实不易,执行这项协议更加困难,有关第三阶段撤军问题的谈判可谓难上加难。后由于内塔尼亚胡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怀伊协议”未能得到实施。

1999年5月以大选,工党领袖巴拉克获胜,取代内塔尼亚胡出任以总理。巴拉克上台后,表示愿努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巴以之间在如何重新确定《怀伊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各持己见。在美国和埃及等有关方面的斡旋和推动下,巴以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于1999年9月5日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签署了执行“怀伊协议”的备忘录“沙姆沙伊赫备忘录”。1999年11月8日,巴以关于巴最终地位谈判在拉马拉举行。谈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巴以争端中最核心的问题,即耶路撒冷地位、巴以边界、巴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安全安排、水资源等问题,因此,最终地位的谈判是艰难而曲折的。

正当人们期待中东和平进程获得突破性进展、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以和平方式结束、巴人实现建

国愿望的时候，中东局势发生巨变，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巴人在血泪中迎来21世纪，而阿拉法特这只满天飞的不死鸟变成了被囚一隅的笼中鸟。巴问题与阿拉法特的命运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领导人沙龙强行闯入耶路撒冷老城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亵渎了巴人及广大伊斯兰国家人民的感情，激发了巴以冲突。这场冲突不断发展，席卷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曾一度扩大到以黎边界。从9月29日开始，叙利亚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反以示威游行。由于叙以处于敌对状态，以在大马士革没有大使馆及其他代表机构，加之美国采取偏袒以的立场，示威者涌向美驻叙大使馆，高呼打倒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有的还向美使馆扔石头，甚至有人爬上墙头撕下美国使馆的国旗踩在脚下。中国驻叙大使馆与美使馆相邻，我目睹了这些场面。为保护美国使馆的安全，叙安全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派大量警察和防暴人员保护美大使馆及大使官邸。我对美驻叙大使开玩笑说：你是受到特殊保护的人。他听后笑不作答。

巴以流血冲突不断升级，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不安，国际外交斡旋活动频繁进行，积极寻求解决办法。2000年10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沙龙的挑衅行为和以军在平息冲突中使用重武器滥杀无辜。阿拉伯国家强烈谴责以镇压巴人的暴行，表示支持巴人的斗争。10月16~17日，美、巴、以、埃、约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多边首脑会议，讨论巴以如何实现立即停火，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问题。但这些举措未能缓和巴以冲突，事态继续恶化。巴拉克与阿拉法特互相指责、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巴拉克难于控制以局势，便于2000年12月9日出人意料地宣布辞去总理职务，提前大选。阿拉法特认为巴拉克属于非鹰非鸽派，他虽不断指责巴拉克，但在巴拉克和沙龙之间进行选择，阿拉法特还是选择了巴拉克，希望他能连任。

但事与愿违，在2001年2月6日以大选中，沙龙当选为以总理。沙龙1928年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原叫阿里埃勒沙因内曼的村子，由于他喜爱自己的出生地沙龙地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沙龙。1947年，他弃农从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在历次中

东战争中屡建军功，以人称他为“常胜将军”。由于他对阿拉伯人采取铁血政策，尤其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下令血洗了巴两个难民营，使1000多名难民遭袭，死伤惨重，因此，阿拉伯人称他为刽子手。

沙龙上台后，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强硬立场，对巴人加大镇压力度。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采取进一步偏袒以色列的政策。9·11后，沙龙以反恐为由不断向阿拉法特施压，逼他就范，阿拉法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他忍辱负重向以做出让步，引起巴内部激进派不满；另一方面，他坚持建国，坚持耶路撒冷为巴首都，坚持他奋斗终生的事业，又招致以的愤怒。巴以流血冲突不断升级，阿拉法特难有作为，沙龙进而指责他为恐怖主义分子，美国也扬言要他下台，巴人呼吁他挺直腰杆继续奋斗。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巴事业和阿拉法特的生命安全、政治前途受到严重威胁。但这位遭遇过九死一生的老战士仍表示，不管他的命运如何，只要活一天，就要为巴事业奋斗一天，这一信念不会动摇。

阿拉法特的战友们说，他的一生闪烁着荣耀，但也充满风险，他享有的巨大荣耀是他遭遇的无数次风险换取的。的确，阿拉法特是位传奇人物，一生中多次遇险，都化险为夷，有消息说，阿拉法特遭遇的未遂谋杀次数几乎与他的年龄相等。他曾对友人说：我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我听到和读到很多有关阿拉法特的历险经历，其中几则事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长期以来，以色列情报局把阿拉法特列作为头号捕获对象，煞费苦心，使尽一切伎俩，但一无所获。以情报局人员曾咬牙切齿地说，如果抓住他，先将他装进铁笼，用直升机吊着从巴人头顶飞过，让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丢尽脸面后，才把他处死。为此，以情报局收买了阿拉法特身边的一位人员，让他把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安装在阿拉法特乘坐的汽车里，以便为以战斗机准确导航，达到炸死阿拉法特的目的。然而令以情报局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那个无线电发射器从没发回过任何信号和情报。后来才知，他们的这阴谋一开始就被阿拉法特识破，无线电发射器也被他发现，他颇为风趣地说：不要忘记，我是位工程师。我一发现以色列飞机在跟踪我，就知道原因所在了。他说着，就把无线电

发射器扔到车外。

1970年,巴解与伊拉克关系恶化,有人欲暗杀阿拉法特。那时,阿拉法特常在约旦的总部办公,一天,他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工作人员为他送来上面写着阿拉法特兄弟亲启的一包文件。他一边发言一边揣摩这包文件,突然,他对警卫说:我闻出这包文件味道不对劲儿,快把它拿走!不出阿拉法特所料,当巴解特工以适当方式打开这包文件时,顿时一股黑烟伴随着巨响冲天而起。

1973年,阿拉法特多次遇险。一次,一名武装分子在巴解驻贝鲁特办事处向阿拉法特开枪射击,子弹从他身旁飞过,他却安然无恙。又一次,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化装成阿拉法特反以组织成员潜入贝鲁特市中心,想从肉体上最终消灭阿拉法特。深夜,以突击队向阿拉法特所在的巴解总部发动突然袭击,子弹打伤了巴解发言人卡迈尔,机智勇敢的阿拉法特镇定自若,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穿过枪林弹雨,最后,出人意料地躲入亲以派控制区,等事态平静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巴解总部。

收买巴人暗杀阿拉法特是敌对势力惯用伎俩。一次,一巴人被收买向阿拉法特食物中下毒,阴谋败露,凶手被处决,阿拉法特却为此哭泣,保证要对死者的家属给予照顾。又一次,以情报局收买了曾在阿拉法特办公室工作过4年的阿布·赛义德,他暗中在阿拉法特的饭里下了毒,阿拉法特对此毫无觉察,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当他吞下第一口饭时,阿布·赛义德突然良心发现,如实地向阿拉法特报告了这一阴谋。

1982年,以军包围贝鲁特,沙龙任指挥,在贝鲁特设置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特务网,其中40人为专门暗杀阿拉法特成员。沙龙曾13次指挥战机轰炸阿拉法特办公室和住宅,并采用了能采取的一切手段,要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但阿拉法特凭着智慧和勇敢,一次次地死里逃生。

长期以来,叙利亚与巴解存在严重分歧,叙情报机构曾欲加害阿拉法特。1983年6月下旬,叙官员约阿拉法特到大马士革会晤,阿拉法特心存疑虑,担心发生意外,是否应邀赴约,迟迟不做答复。从中牵线的一位苏联官员一再对他做工作,表示不会发生危险,阿拉法特才决定赴约。按他通常的做法,会晤结束后便立即返回特里波利,但这次一反常态,本人留在大马士革,却派出一个车队掩护

一辆防弹奔驰车于当晚离开大马士革,按原路线返回特里波利。叙情报部门按预定计划行事,在半路设下埋伏,当巴解车队进入伏击圈,埋伏的突击队员发起突袭,车队被炸毁,13名巴解战士全部丧生。

巴解总部迁到突尼斯后,其设在突尼斯城南部的巴解总部占地700多平方米,有两栋楼房和几座别墅,周围是学校 and 民房,又在突尼斯城另设一办事处。按惯例,阿拉法特出访归来一般都在总部办公、住宿,并在第二天上午召集领导人开会。以情报机构了解此情后,向突尼斯派出一批间谍,主要任务是解决阿拉法特和巴解其他领导人。据以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阿拉法特定于1985年9月30日晚从摩洛哥飞返突尼斯,于10月1日上午召集巴解领导人开会。以最高当局决定空袭巴解总部。10月1日拂晓,以派出8架F-15战机、两架波音707加油机、两架KG-130H加油机、两架波音707电子干扰机,40分钟后,又派出8架F-16战隼式战机。10时5分,以战机对巴解总部进行突袭,抛下450公斤炸弹、8枚幼畜式空地对地导弹及激光制导灵巧导弹。空袭命中率极高,炸毁巴解总部5座建筑物,炸死炸伤260多名巴人和突尼斯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巴解总部人员,但阿拉法特安然无恙。

阿拉法特逃过此劫,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幸运。原来,阿拉法特于9月30日晚飞抵突尼斯后并没直接回巴解总部,他先到巴解驻突办事处处理工作,一直忙到深夜。当他准备上车赶回巴解总部时,其助手又递给他一份特急件。他处理完此急件后,已经很晚,便在办事处过夜。第二天上午10时许,他乘车前往巴解总部,在靠近总部的路上得知以突袭的消息。当他赶到现场,看到总部已是一片废墟,尸体遍地,不禁悲痛欲绝。

为逃避敌人的暗杀,阿拉法特经常化装,扮成老人、牧人或妇女。1970年,约旦军队重创巴解在约的游击队,严禁阿拉法特逃出约旦国境,正当阿拉法特及其助手无计可施之时,恰巧科威特国防大臣萨利姆飞抵约旦首都安曼,在约旦和巴解之间进行调停。萨利姆见阿拉法特与他在高矮胖瘦上都差不多,便脱下身上的长袍给阿拉法特穿上。阿拉法特凭着这件长袍,乔装打扮,顺利地坐上约旦军方为科威特国防大臣提供的装甲车赶赴安曼国际机场,离开了约旦。

阿拉法特有支精明能干且十分忠心的警卫队，警卫人员为他制定了极为严密的安全措施，配备了十几辆不同型号的防弹车。阿拉法特的行踪飘忽不定，从不将住所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事先透露他动身的时间和去向，甚至对夫人也保密。他的卫队代号为第17部队，交谈时使用不同暗号。

有人问阿拉法特，他遇险百次而无一难，其奥秘何在。阿拉法特笑而不语，巴解负责安全和反谍报机构官员哈拉夫曾坦言相告：60%是靠阿拉法特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30%是靠运气；另外10%可以记在我们情报机构的功劳簿上。当阿拉法特兄弟乘坐汽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就连我们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他何时动身，走哪条路。

1992年，阿拉法特乘坐的飞机在利比亚遇险，却又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当时，我正任中国驻利使馆的政务参赞。

那年4月7日傍晚，阿拉法特结束对苏丹的访问，乘安东诺夫轻型飞机离苏丹经利比亚返回巴解总部所在地突尼斯，其座机进入利比亚东南部时都与利保持着联系。利东南部是雷卜亚纳沙漠，当天晚上，这片沙漠上空突然刮起一股数十年未遇的强风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阿拉法特的座机受到这股风暴的猛烈冲击，死神在向机上人员挑战。怎么办？继续飞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危险；选择适当位置着陆，虽要冒很大危险，但还有生存的希望。这千钧一发之时，机上全体人员都把目光投向阿拉法特，等待他做出最后决定，这是一项生死攸关的决定。阿拉法特久经沙场，他的一半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曾遇到过各种险情，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遭遇如此强大的沙暴袭击，也是第一次。他镇定自若，叫机组人员继续与利有关方面保持联系的同时，果断决定，选择适当位置尽快着陆。在沙漠中选择着陆点，是既易又难，易的是广袤沙漠到处可降落，难的是飞机降落既要避免被沙暴掀起的黄沙覆盖，又要比较容易地被救援者发现。最后，阿拉法特决定飞机降落在一个沙丘上。在阿拉法特的指挥下，经机上全体人员的奋力拼搏，飞机成功地降落在利比亚萨腊西南约70公里的沙漠中。

晚8时45分，阿拉法特的座机从利比亚雷卜亚纳上消失，利领导人卡扎菲得悉这一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指示有关方面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惜一

切代价找到阿拉法特。鉴于利比亚东南沙漠广大，沙暴仍未停息，利比亚在采取一切措施的同时，还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气象组织、人造卫星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有关国家进行联系，要求它们帮助营救阿拉法特。利出动了数十架侦察机、直升机、急救机、战略和轻型运输机，派出大批车辆和数千名军人，在当地警察、治安人员和群众的配合下，形成搜索网，仔细寻找。经过12小时的努力，利营救人员终于找到了阿拉法特的飞机。阿拉法特的座机上共17人，机组人员做出了最大努力，保证了阿拉法特的安全，但飞机已断为三截，还有3名人员死亡，5人受伤。

阿拉法特脱险后，被送往一家医院治疗，经检查，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无内伤，只是右眼上方受了点轻伤。卡扎菲偕其子女前往医院慰问。阿拉法特对卡扎菲一连说了6个谢谢后说，他在4月7日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耶路撒冷祈祷。并表示，相信他与卡扎菲将有机会一道去耶路撒冷祈祷。此事过后，不论是阿拉法特的友人还是敌人，都一致称他为巴勒斯坦的不死鸟。

该年4月10日，阿拉法特康复后离利回到突尼斯，接着又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在阿拉法特的记事本上，从来没有专门用作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一年365天，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8小时左右，睡眠一般不超过5小时，甚至这5小时也要分作两段，前段是清晨4时到7时，后段是下午4时到6时。他处事果断、知识渊博、记忆力强、不吸烟、不喝酒，惟一的嗜好是喝茶时放上一匙蜂蜜，算是最好的享受。

阿拉法特是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的婚姻也带有传奇色彩，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在科威特工作期间，有过令他终生难忘也为世人广为流传的爱情佳话。当时风华正茂的阿拉法特对革命事业有强烈的热情，对爱情婚姻也有美好的向往，他在盛产石油的科威特工作当建筑工程师，完全能积聚钱财，成为富翁，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当时，他的好友多次为他搭桥，都被他谢绝。据他战友说，阿拉法特曾有过恋人，但为了巴勒斯坦事业，只好忍痛割爱，曾一度做出终生不娶的决定。若干年后，他在回忆这件往事时痛苦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个凡人，何尝不想妻室儿女，但我知道，无数的艰难困苦等着我，我不忍心让一名妇女承受这些艰

难困苦。因此,我决定终生不娶。我认为,我应该为我的人民,为所有的孩子做出牺牲!这是一个铁骨铮铮英雄汉的由衷之言。1985年,阿拉法特的大姐英阿姆对我提及这件事时,颇有感慨地说:他为了巴人做出了最大牺牲,虽没有自己的儿女,但所有巴勒斯坦孩子都是他的儿女。

阿拉法特在青年时代曾立下终生不娶的决心,但随着情况的变化,他的爱情观也发生了变化。他在贝鲁特巴解总部工作时遇到过他所喜欢的女人娜达·亚鲁斯,她皮肤白皙,一头棕色头发,身材娇小但充满活力。娜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决心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她加入了巴解,是该组织中一位活跃人物。她嫁给了法塔赫的一位领导人,夫妻志同道合,常住黎巴嫩,与黎当局及各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不幸的是,她丈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1971年,阿拉法特在贝鲁特第一次见到时年30岁、丧偶的娜达时,对她留有深刻印象。他俩后来交往甚密,渐生感情。1975年,黎国内爆发大规模内战,穆斯林与巴解为一方,基督徒为另一方,展开激战。由于娜达与交战双方都有良好关系,便成为沟通交战双方的桥梁。一天夜里,她从总统府返回住所时,突遭暗杀身亡。当阿拉法特听到噩耗时痛哭失声,悲恸欲绝。后来,当有人问及这段恋情时,阿拉法特坦诚地说,确有此事,当时他已向娜达求婚,娜达也已同意。不幸的是,这段恋情以悲剧告终,此后,阿拉法特再次把婚姻问题置于脑后。

千里姻缘一线牵 这句俗语很适合阿拉法特。1989年,阿拉法特访法时,偶遇苗条漂亮的金发女郎苏哈·塔维尔,对她产生好感,便问及她的家庭、身世、学历等情况。得知苏哈是巴勒斯坦人,祖父是农场主,在海法以北拥有一座城堡和大片庄园,其父是银行家,有三个姐妹及一个兄弟,分别在巴黎、罗马和华盛顿受过教育,她本人在巴黎大学读过外国文学。苏哈一家都信奉基督教,本人热爱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在征得苏哈同意后,把她带到自己身边任秘书和参事工作。他俩在频繁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于1991年10月在突尼斯按伊斯兰教方式举行了婚礼,并在伊玛目面前交换了结婚戒指。婚礼办得非常简朴,阿拉法特穿着他平时穿的那身军装,头戴方格头巾。苏哈也穿着平时的

衣服,只在外面套上了一条浅色裙子。

婚后,他俩对婚姻严格保密,生活俭朴,但很幸福。苏哈说,我们没有固定住所、家具,全部家当只需一辆小汽车的后备箱就可装下,一切都是临时凑合。出于安全考虑,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转移。婚前,阿拉法特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活已过了40多年,婚后,苏哈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苏哈说,他们对人生的价值看得要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阿拉法特与苏哈团聚的时间极为有限,一旦相聚,有说有笑也有爱。他俩年龄虽差33岁,但感情甚笃,喜欢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看电视,互荐名著,交换对问题的看法。当人们问苏哈为什么要嫁给阿拉法特时,她回答说:我是百分之百心悦诚服地嫁给他的。我对他的感觉大概同二战期间法国人对戴高乐的感觉差不多,他是独立和统一的象征,他靠憨直与真诚打动了我。当记者问阿拉法特为什么改变初衷决定结婚时,他当着苏哈的面说: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能接受我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苏哈喜欢称阿拉法特为老头子,有时叫他阿布·阿马尔或主席。她这样评价阿拉法特:在形势最恶劣的紧张关头,他从没沮丧、气馁过。他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他属狮子座。1995年7月23日,苏哈生育一女,取名扎哈娃,与阿拉法特母亲同名。据苏哈说,这是阿拉法特为纪念其早逝的母亲而给女儿取的名字。苏哈非常爱女儿,祝愿她能度过美好的童年,有理想的前途,不希望她将来从政。她解释说,政治生活太困难、太艰苦了。

婚后的阿拉法特并未改变原来的生活、工作方式,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到深夜甚至天亮。有时,阿拉法特的岳母塔维尔夫人出面要求阿拉法特多关心一下家庭生活,对他说:现在已是深夜了,你的妻子和女儿还在等着你哪!阿拉法特听后两手一摊,对岳母直言说: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事要处理,怎么离得开!他不顾岳母的劝告,继续工作。1999年8月4日,阿拉法特在加沙庆祝了他的70大寿,但其夫人和女儿都未能出席庆祝活动,引起一些流言蜚语,一些媒体刊登消息说,阿拉法特与苏哈的婚姻出现危机,甚至苏哈的母亲塔维尔夫人也在谈论这事。正当外界盛传阿拉法特夫妇可能发生婚变时,苏哈回到加沙。她说,她担任巴勒斯坦最高妇幼委员会主席,一直在为这一事业全力

工作,为争取外援和募捐奔走,她是在执行阿拉法特的指示。她批驳了有关她与阿拉法特婚变的谣传,再三强调她与阿拉法特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夫妻生活是美好的。她对《巴黎竞赛画报》说,她和阿拉法特都不是那种把爱情挂在脸上的人,他俩相爱,但不外露。她对媒体说,阿拉法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丈夫。对她母亲的言行,苏哈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情报部门企图在巴勒斯坦队伍内部制造事端,破坏巴勒斯坦事业,而她的母亲中了圈套。苏哈为维护阿拉法特和她俩的爱情、巴勒斯坦事业,毅然做出决定,宣布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她说,为了巴勒斯坦的神圣事业,全体巴勒斯坦人必须维护自己的民族属性与巴民族团结。她还强调指出,阿拉法特温柔而富有感情,是有魅力的男性,具有难能可贵的谦恭品格;她爱阿拉法特,不是把阿拉法特作为象征去看他,而是爱他这个人;她是阿拉法特的妻子,一直在向阿拉法特学习。随着历史的发展,她已成为和平的战士,继续当革命者,为重建家园这一惟一目标而奋斗。

阿拉法特是中国人民长期熟悉的老朋友,曾十多次正式访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些访问和会见加深了巴中人民间的友谊,有助于中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了解和支持。他对中国在中东问题和巴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热情赞扬和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巴人争取恢复合法权利的斗争。在1964年巴解成立时,阿拉法特首次访问中国。1965年5月,巴解在北京设立了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同年11月20日,两国建交。中巴建交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国领导人不断接触,信件来往频繁,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中巴友好关系,中国向巴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1984年5月,阿拉法特第4次访华。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亲切会见了她,我担任翻译。邓小平对阿拉法特说,你们为了自己的正义事业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看来任何正义的事业都要经过艰难困苦,中国永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1989年

10月,阿拉法特以巴勒斯坦国总统身份访华,邓小平再次会见了她。邓小平高度评价中巴人民之间的友谊说,我们的关系是几十年如一日,是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典范。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关系。邓小平强调说:你们争取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将近4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间相当,应该说我们是40年如一日的友谊,再过40年,我们就是80年如一日的友谊,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此后,阿拉法特又多次访华,与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见、会谈,为增进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新贡献。

1997年9月,我出任中国驻也门大使,与巴勒斯坦驻也门大使叶海亚经常交流、晤谈,每逢我们聚会时,他总是热情地向我介绍一些有关巴事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和一些阿拉法特及其亲属的有关情况。叶海亚大使告诉我,阿布·阿马尔兄弟尽管公务繁忙,年事已高,但身体仍然健壮,精力非常充沛,可谓老当益壮。阿拉法特的夫人苏哈是位高尚的女士,是贤妻良母,也是阿拉法特的贤内助,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干扰阿拉法特的使命。她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在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阿拉法特的女儿扎哈娃聪明活泼,在父母尤其是在苏哈的培育下茁壮成长。

1999年11月,我出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多次见到巴解驻叙利亚代表马哈茂德·哈利德,他是阿拉法特的老战友,向我介绍了阿拉法特的有关情况。听完叶海亚大使和哈利德代表的介绍,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衷心祝愿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取得胜利,祝愿中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并请他们转达我对阿拉法特等老朋友们的问候和祝愿。

2000年4月15~16日,应阿拉法特总统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巴勒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勒斯坦,江主席与阿拉法特总统举行了会谈。同年8月,阿拉法特访华。2001年,阿拉法特再次访华,这是他对中国进行的第14次访问,江泽民主席称他为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一面旗帜。2003年9月,中国多次表示,反对以色列驱逐阿拉法特。